

# 何以独具匠心<sup>〔\*〕</sup>

## ——中华传统知识与工艺的合与离

彭兆荣<sup>1,2</sup>

(1. 四川美术学院 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 重庆 401331;

2. 厦门大学 人类学与民族学系,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知识与技艺素来是历史发展过程中两项最重要的社会价值的评价指标,它们既是人类认知性分类产物,也是对文明发展评估的依据,不同的文明类型和体系也因此迥异。中国在历史发展中呈现出知识与技艺统一、分离和协作的大致线索,也表现出对“事”与“物”之“格物致知”独特的中式探索之方法论,《天工开物》即为范。专此提出“手工文明”概念。我国当下面临新的知识与技术全新整合的任务,“大国工匠”之“工匠精神”无疑是传统的创新,其中最重要的正是建构知识与技艺的新型协同范式。

〔关键词〕“匠-心”;知识-技艺;手工文明;《天工开物》

DOI:10.3969/j.issn.1002-1698.2020.02.010

### 一、引言

“独具匠心”意指在技艺上具有独特的创造性。传统的“匠心”为天然合成,自然造化,诚如欧阳修云:“匠之心也,本乎天巧。工之事也,作于圣人”。笔者借此成语意在将“心”(认知、知识)与“匠”(工艺、技艺)分别于各自的表述阈限,专门就“知识-技艺”范畴、范式加以讨论,既包含“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孟子)中“心(脑力)/力(体力)”之区分与排斥;也涉及中国传统主张的“知”(知识)与“行”(行动)协作

模式;同时关乎知识与技能的复合、协作的历史关系:从“心/匠-脑/体”匠心合力,到匠心分离,到匠心趋近,再到“匠-心”协同等不同阶段的历史辙迹。这一条线索的变化与变迁,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历史的价值趋向和人文关怀的维度,也反映特定历史时段社会的繁荣程度。

由于在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历史时段中,手工技艺的“被边缘化”,即被置于“劳力”之范畴,今天需要特别提升之。为此,笔者提出“手工文明”概念,且与当代语境相契合。这一概念与中华民族崛起之“大国工匠”“工匠精神”的表述簇

作者简介:彭兆荣,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首席专家,厦门大学人类学与民族学系教授(一级岗)、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文学人类学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类)重点项目“中国特色艺术学体系研究”(批号:17AA001)的阶段性成果。





相关联,将“手工文明”之长时段背景与当下语义做历史谱系的链接。换言之,“大国工匠”本身就是手工文明的现代表述。可以想像,如果没有“手工文明”,“大国工匠”“工匠精神”便有无水之源、无本之木之虞。反之,“手工文明”也因此包含“工匠大国”的伟大复兴。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华文明确实包含着手工文明,尤其是农耕文明的基因,而我们在今天做相关的谱系梳理正是社会所急需的工作。

## 二、考工记

在中国,“匠”通常与“工”并用。最早对“工匠”作权威论述的是《周礼·考工记》;《周礼·考工记·匠人》作如是说:“匠人建国,水地以县,置槷以县,眡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昼参诸日中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sup>[1]</sup>大意是说工匠营造都城时,用悬挂准绳的方式以确定水平,用观察日影的方式以保证竖直。白天以日晷来观察太阳,夜晚以观察北极星位置的方式来确定时辰。工匠营建都城,九里见方,每边辟三门,纵横各九条道路,南北道路,宽九条车轨,东面为宗庙,西面为社稷坛,前面是朝廷寝宫,后面是市场和民居。正所谓“天有时,地有气,材有美,工有巧,合此四者,然后可以为良。”<sup>[2]</sup>从我国古代一些都城遗址的形制看,确实依此“匠人建国”之范而建,比如河南洛阳的偃师商城遗址的城郭大致以此形制为范,形态为南北走向的矩形。<sup>[3]</sup>



由是观之,“工匠”原型包含着中华“手工文明”的基因,体现了“天人合一”的宇宙观。所述的技术工具如圭表、日晷等,为我国古代发明的度量日影长度、时间的天文仪器,早在公元前7世纪的中国已使用。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天象学)之所以发达,重要原因是观测天象,制定历法,“规矩”便不可缺少。我们自古就有“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之说,此说出自《孟子·离娄章句上》:“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

方圆;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sup>[4]</sup>孟公将“规矩”上升到“仁政治国平天下”的高度,足见其重。按照《周髀算经》的说法:“圆出于方,方出于矩”;“既方其外,半之一矩,环而共盘(圆)”,即以规(圆)校矩(方)。有意思的是,依据中国的创世神话,女娲伏羲作为华夏民族人文先祖,他们阴阳共体,造人补天。在兄妹二人的画像上,女娲手持圆规,伏羲手持曲尺,即“规矩”,表明天下方圆合规矩之制。“规矩”者,手工之制、之作、之器也。

“工”在甲骨文中作,指工匠和使用的器具。《说文解字》:“工,巧饰也。象人有规矩也。与巫同义。”<sup>[5]</sup>匠,古鉢字形即 (筐)加 (斤,斧子),像筐篓里装着刀斧工具。本义为执刀斧工具的木工。《考工记》中的“匠人”指的正是营造城郭时的古代土木工程师。“匠”也泛指或意指动手的专门技艺。“工匠”在历史上曾经被描述成为“知者”“巧者”。更有甚者,工匠之技能不独可以指“圣人”的本领;反过来,工匠之技能亦皆为圣者所创:“燦金以为刃,凝土以为器,作车以行陆,作舟以行水,此皆圣人之所作也。”<sup>[6]</sup>我国“英雄祖先”中的多数圣王大都为工匠始祖:炎、黄、尧、舜、神农、后稷等几无例外,这也符合“手工文明”肇始阶段需要建构“名正言顺”之正统规制。回观商周时期的青铜礼器,无妨为“国之重器”的样板,<sup>[7]</sup>甚至“中国”之名亦出自何尊之铭文,出自工匠之手。而中华民族文字的创造也是“工匠”镌刻的产物,无论是石鼓文还是甲骨文。

这种“工匠圣王”原型成为中华民族手工文明中知识技能的重要话语表述,以下诸点为要:首先,将“天地人和”的思维形态嵌入其中,思维-知识-技艺一体化,“天工”之说可为佐证。此说典出于《尚书·皋陶谟》:“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意思是说天的工作由人代替执行。明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之标题遂引之。

其次,工-王-巫实有交集。“工”在造型

上也作祈祷之祝咒器具之像,与“巫”字相同。“工”在甲骨文中的另一种写法,表示祭祀时手持巧具,祝祷降神。“巫”的古字形()为双手把持“工”。<sup>[8]</sup>《说文解字》:“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象人两袂舞形。与工同意。”<sup>[9]</sup>古之“巫”者,代王、为王与天沟通。人类学大量民族志资料证明,在远古时代,“神-王-工-巫”同体,这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极为常见。<sup>[10]</sup>中国殷商时期,贞人与王有时是合作的,有时王亲自充当巫师与天沟通。“巫”在古代是一门专门技术,亦属“工”之范畴。大量的占卜材料契刻在龟甲或兽骨上记事。中国早期的医者亦由巫师充任,“医”在古代可写作“醫”。由于医是巫发展而来的“百工”之一者,《管子·权修》:“上恃龟策,好用巫医”,此处的巫医实指巫者一事而已。<sup>[11]</sup>

再者,古时“王-工”在功能和工作上表现为一体性,这不仅在文字表述和造型意象上有迹可循,身份亦有案可稽。古之“王”者,必有“国”(口、國、廓、郭)。国初指城郭,特别是王城。王之所居,以统天下,以治四方。在此,要当“王”,先得建造王城,《周礼》之开言便有“惟王建国,辨方正位”。<sup>[12]</sup>说明“王”者必须以“匠”者辨识方位。“国”在甲骨文中即从口,指城邦建设之立正辨方,原为工匠定基立中之务,故郑玄谓《考工》有“匠人建国”“匠人营国”之谓。<sup>[13]</sup>在这里,“王-匠”同畴,王为天子,匠为天工。“王-匠”营建城郭还包含设计和治理的意思,故“匠”就有“治”(治理)之意。<sup>[14]</sup>这样,“王-工”既成了“工业”(古之工业非今日“工业”之特指,为行业、生业之泛指)的能工巧匠,包含治理国家的思想和方略,还是知识与技能的复合性表述。换言之,当时的工匠技艺与国家大政没有分开,且为“国之工艺”;逻辑性地,“匠”与“心”没有完全分割,而是互为表述。

概而言之,我国古代的手工文明以及所知的“英雄祖先”神话中,“匠”——动手,特指工艺、技能等,与“心”——动脑,特指知识、表述,以及

对国家的治理总体上是一体化的。虽然当时的“百工”之泛称已有行业分类之雏,但“脑-体”分离的迹象并不明显,当然也更谈不上重“心”轻“匠”的隔阂,也没有重此抑彼的明确分制。

### 三、分庭记

虽然世界上不同的文明各自有着不同的演化辙迹,衬托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然,作为“人类”这一相同的物种,必有其相同的品质和属性,那是什么?窃以为是手工文明,即手工(手的工作),这是“文明”相共者。就社会结构论,在任何社会,脑-体的分工协作都是社会健全和健康的重要依据。就社会功能而言,满足人们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两个方面必须兼具和兼备。工匠阶层首先体现在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同时也包含了文化、精神和审美方面的内容。“获得生活必需品所需的‘辛苦劳动’和与生活必需品‘融为一体’的愉悦,是生活循环的最基本层次,是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sup>[15]</sup>然而,不同的文明体制又赋予“知识-技能”的差异。在古代希腊的城邦制社会,对于从事体力劳动的阶层,特别是工匠是不被信任的,甚至将手艺人称为“贱民”。那些从事体力劳动的人和工匠大多由奴隶和战俘所充当。类似的观点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儿都能见到。马克思对于这样的划分显然不认可,在马克思看来,所有的“工作”都是“劳动”,而只要是劳动,差异仅仅是分工,不存在任何“奴性任务”。<sup>[16]</sup>

从人类进化的角度看,正是由于特别技艺的出现,比如工具的制造与革新所导致的产业革命,推动了文明向前迈进一大步。工具和技术对文明具有重要的推动性的看法几乎为人类所共识,早期不少人类学家正是从这一角度认知和看待文明的。所以,贬抑“手的工作”,褒扬“脑的工作”原本偏颇。而在西方的历史传统中,为了平衡二者的关系,又在“技艺”层面做了进一步分离,即用“自由/奴性”在性质上加以区别,于是有了“自由的”艺术家和“卑贱的”技工的区

分。<sup>[17]</sup>这样,艺术家和工匠被“二次划分”,并出现了两个基本维度:1.与真理(即“神”)的距离。经典案例是柏拉图《理想国》中所谓“床”的表述,即将“神”(化身为哲学家)制造的床提升到自然真理的高度,建构出哲学家、画家(艺术家)模仿的床和木匠打造的床三者与“真理”的距离关系。<sup>[18]</sup>在那里,哲学家离真理最近,画家其次,工匠最远。2.“美-用”关系。这样的划分潜在着一个原则和标准,“美”无用,反之,有用不美。这也是西方“美/用”区分的滥觞。<sup>[19]</sup>这一原则即便在今天仍可见历史端倪和变化痕迹,人们只要到西方的博物馆、美术馆走一遭便可了然。

西方的技术(technology)、技艺(skill)、艺术(art)等都源于手(arm),与古希腊词  $\tau\epsilon\chi\nu\eta$  有关,手艺人 and 艺术家在古希腊都被称为“ $\tau\epsilon\chi\nu\iota\tau\omega\nu$ ”(掌握技术的人)。这间接地与“艺术”中的“美/用”二元对峙的绝然两分存有关系。当然,西方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分合的态势,因为“如果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逻辑可寻,那么这个逻辑并不完全是独立的。技术发展首先需要一种协调,因为孤立的技术是不存在的,它需要其他辅助技术”。<sup>[20]</sup>这个体系的基础暗示了其在人类文明进化过程中特定时段的体系关系。“一个技术体系构成一个时间统一体。它意味着,技术进化围绕着一个由某种特定技术的具体化而产生的平衡点,达到了相对稳定的状态。”<sup>[21]</sup>值得注意的是,近代西方,手工技艺的社会化已经逐渐地形成了一种生活化的工作方式,一些实用型的艺术家也自觉地融入到“艺术的实践生活”中。滥觞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大地上的工艺美术运动(Arts & Crafts Movement),即与当时一些艺术家及人文知识分子对人们的工作方式、生活方式以及整个时代状况的看法有着重大关联,这一运动特别强调手工创造的价值。<sup>[22]</sup>工艺美术运动不仅清晰地表明西方“美/用”对峙在近当代的反思态度,也对工业化机械替代手工的趋势提出了质疑和挑战。

中国的手工文明原型与西方的差异甚殊,比

如在中华文明的工艺传统中并不存在西方式的“美/用”二元对峙形制,主要原因在于传统的工匠技艺和技法已然将天与工、道与器、法与技、知与行等融汇贯通。《庄子·养生主》更有“道也,进乎技矣”之说。<sup>[23]</sup>“真理”与“技术”相互兼容。另一方面,中国的“技艺”很早就有了细致的分类。《周礼·考工记》对此已经有了详细的陈述,“百工”之分成为传统,一路沿袭。元代木匠人薛景石所著《梓人遗制》介绍木器形状、结构特点、制造方法为主。明代的《髹饰录》是我国古代唯一传世的漆器工艺著作。分“乾”“坤”两集,共一百八十六条,涉及髹饰历史、工具、原材料、技术、漆器品种、漆工禁忌、仿古和修复等方面。同时代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是继《考工记》后另外一部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手工技术资料。书中详细记载了我国三四百年前流传于民间的多种工艺技术,计十八类一百零七项。

由于不存在“美/用”对峙和分隔,也就没有“二次分类”的问题。我国的“手工文明”所遵循的是“美用一体”的原则。然而,从中华文明历史进程看,却分明存在着“脑-体”分合离散的演变轨迹,即将动脑和动手相区隔。动脑者主要表现为士阶层(“文人”阶层)的出现,这无疑决定“脑-体”分隔的一个重要历史现象和社会理由。关于“文人阶层”的出现和形成,史家有不同的观点,此不赘。“文人”(泛指古代的知识分子),以“士阶层”为主体。导致“匠”与“心”的分离,即所谓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根本原因是由国家的政治体制所主导。其中主要有几个因素:1.随着社会分工的细致化,早期的那种“智匠一体”和人才形制逐渐趋于分离,文人的“文字专属”阶层逐渐凸现。2.国家政治的“一统性”越来越需要一批专门的“劳心阶层”来辅佐、参政。3.科举制度的出现,使得那些“智力”突出的人士得以光耀门庭。从汉代的察举制,到隋朝开始实行科举制,都在鼓励士阶层的“劳心”作业。4.历史上有些朝代甚至于亮出“文人治国”之举,比如,北宋通过改革,采取了



以文立国的文人统治。宋太祖把科举制度作为人才选拔的基本制度,文官出任中央及各地最高行政长官,地位居于武官之上,更将“工匠阶层”挤出社会主流阶层之外。

“劳心-劳力”不平等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传统中延续,虽然不同的时代、朝代在二者之间平衡和弥合上的情形不完全一样,但整体上却没有达到平等协作的地步。西方学者对此有专门的评说:宽泛而言,中国的读书人和匠人在获取知识和产出知识上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匠人们制物、做事借助于经验获得知识,通过尝试和犯错误来检验知识。匠人所拥有的知识,大多是“体化知识”(embodiment knowledge),或者说是“意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是无需用语言来传达的,无需用文字来记录的;中国的读书人则着力于文本研究,解读其含义,发挥其立论,就哲学、文字学、文献学或者政治领域内的诸多问题编写经典文献的注疏、集注。读书人有可能获得高等身份、社会地位以及政治影响;而那些因劳动而双手脏污的人往往都是底层小人物。<sup>[24]</sup> 这样的描述虽然实指明代的情形,但在总体上符合整个封建社会。换言之,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工匠以及“手工劳动者”都被置于低于文人阶层的地位。

概而言之,上述所表之“分庭”除了辨析中西方在工艺上的“美用对峙”与“美用一体”的差异外,侧重于表述在不同的文明体系中,尤其是在中国封建社会等级森严的社会伦理体系中,赋予了工匠和工艺的相应价值,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时段“脑(心)-体(力)”聚首和分离变迁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评价体系。

#### 四、协作记

从表面上看,知识与技艺的协作属于“百工”之间的关系形制问题,事实上也与人的“知行合一”的理想价值和方法论有关。知识与技艺原本无法截然分开,在许多情况下,二者彼此相融,难以泾渭。从历史的情势看,决定知识与技

艺的聚合与分离趋向的主要力量来自于特定历史时代、时段国家的主导性伦理价值,而学者、知识分子、士族等阶层的追求既反映了时代特殊语境的社会价值(常态),又表现出个人的追求风格(异态)。明代的历史情形以及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就是一个典型的例证。德国学者薛凤对《天工开物》的研究,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表述和“他者叙事”,<sup>[25]</sup> 也为我们呈现了一幅明代知识与技艺的真实景象——传统的和特定的,社会的和个人的,理论的和方法的“常态”与“异态”。

从社会功能上看,“知识”(脑力、劳心)与“技能”(体力、劳力)的粗泛性划分只表明一个社会认知价值方面的分类。“分类是指人们把事物、事件以及有关世界的事实划分成类和种,使之各有归属,并确定它们包含关系或排斥关系的过程。”<sup>[26]</sup> 无论是从人们的认知角度,还是从事物的功能、工具角度,分类都伴随着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知识-技能正是人们认知和社会化需求的必然产物,也是分类的产物。今日的社会、科技、学科、专业等越来越发展,正是各个领域“分类”越来越细致化的结果。然而,分类只是认知性表述的“一翼”,或一个面向。效应上,分类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整合”才是最终获得完整效益的目标,仿佛“零件”与“机器”的关系,所有这些“零件”只有按照理念、设计组合、组装起来,才是真正的“产品”。

从国家层面上看,国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除了反映出传统中相对稳定的价值外,也会表现出特定、特殊的价值体系。明代就是一个例子,其特点之一是匠人群体与国家实体比前朝更密切地关联在一起。比如著名的南京古城墙的修建,20万民工和匠人参与这一工程,许多数据和人名被刻在修建城墙的砖上。这一宏大的历史文化景观今天仍然在目。虽然,中国古代大都有工程营建和工件制造的专门机构进行管理,也有宫廷的专属工匠和作坊,而且工匠将自己的名字刻在砖瓦和工件上的先例,早在先秦就已经有了,

到了秦代,这一形制被保留了下来。<sup>[27]</sup>然而明代“重工”(工匠、工程、工艺)的国家主导价值相对鲜明,特别是国家介入生产,让实用工作领域,比如食盐、丝绸和瓷器生产,变成了政治问题和官府事务。而在学者和文人所出现的新研究话题也与之有涉,原因是国家聘任一位官员做这些低等手工劳动的管理者,这挑战了“只会识文断字”这一学者角色,也强化了关于“知与行”的讨论。<sup>[28]</sup>显然,朱元璋将制造业纳入国家掌控之内,这一做法对明代学者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封建社会的文人阶层总体上有两个特性:“忠君”和“事国”。无论这个群体内部有多大的差异和分歧,无论他们的官阶和等级高低,无论是“在朝”还是“在野”,“尽忠”之道德与“事国”之学问的主流价值一路而下,至今犹存。

从个人层面上看,文人阶层在“忠君”和“事国”的仕途上往往坎坷多舛,而表现出非常个性的“匠-心”追求的印记,宋应星的《天工开物》即为典型。总体上看,宋氏所认知的理念和贯彻的原则与传统文人总体上是一致的,但因仕途不顺,转而与功名进取毫不相关的“实学”却表现出了个人独特的价值追求。<sup>[29]</sup>这些在他身上体现了“双重人格”的矛盾,也正是这一矛盾使之成为文人阶层中罕见的“复合人才”。主要表现在:其一,“工”先“理”后。《天工开物》开篇之首先述“乃粒”,即谷物粮食,因为“生人不能久生,而五谷生之”<sup>[30]</sup>——人不吃饭便活不了的道理,隐含着“唯物主义”的道理。其二,“天理-天工”并置。一位默默无闻的小学者,却要承担使世界秩序更有序的历史使命,就像士绅阶层一样,肩负“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礼记·大学》)的责任。其三,“且述且作”。他在“实学”的实际操演中著述,不像传统的文人埋头于文字,“述而不作”。《天工开物》即述作并举之经典。其四,重技轻人。宋氏在追求“实学”中仍然保持着士者的矜持:他在书中遴选了十八种工艺,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物质和程序上,对工作流程进行记录,却很少将注意力转移到手艺人身上。

<sup>[31]</sup>其五,表述范式。宋应星回归现实,俯身下层,参与实践,注重细节,旨在致力于一种新的治学方法和修辞风格,他开拓出一种新的表述性修辞方式,转变同时代以及经典的言说风格,将工艺和技术提升为知识的基础。

从方法论角度看,“开物”之“物”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概念,这也是“手工文明”中的重要内涵,包含通过对“事”与“物”的知识、技术的关联性进行“格物致知”之求索,涉及到中国学问传统(知识)中问学(求知)的方法论问题。其中“格”为关键,意思有:1. 到达、度量等义。《苍颉篇》:“格,量度也”,意为量度天地之事。<sup>[32]</sup>2. 宣告,通告。“格”有“告”之意,即通告预知,<sup>[33]</sup>与“格天”意思相通。3. 降临。《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指神灵降临之意。4. 借,借助等。《尚书·西伯戡黎》:“格人元龟,罔敢知吉”(把大龟借给别人,我们就不知吉凶了)。5. 物理之学。近代以降,“格物学”“格致学”与西方的“物理”合流,转义为物理学。<sup>[34]</sup>

概而言之,知识与技艺原本为“一体双面”的复合体,“脑”(心)与“体”(力)仿佛身体之左右手,相互协作。然而,分类是人们认知世界的必由之路。作为国家之社会组织,需要将一个庞大的整体分割成为不同的部分,并对不同的阶级、群体、知识、技艺、行业等进行等级划分和管理,越是细致,社会越是发达。中国历史上的二元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华文明的演化轨迹。

## 五、结 语

今天,中国正处于一个腾飞的历史时期,也迎来了知识与技能“新协同范式”的时代。我们更迫切地需要反观、反思、反走,包括诸如学科中的学人、学术、学问;理论与实践的整合、组合、融合;“大国工匠”的元素、要素、因素;“复合人才”所具备的素质、品质、特质;大学学科分制中的文科、理科、工科;建设与工程的财政、行政、廉政等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重新审视、评估,进而创

造出新的“知识技艺”体系。

概之，“匠”“心”若分离如何“独立”？“匠—心”一体方可“独具”。惟知者、行者，心者、力者，虚者、实者，智者、技者，通体协作，方可致“天工”而达“开物”，是为笔者心中理想之“独具匠心”。而与之相属的“手工文明”是中华文明的基础和有机部分，特别在中华民族伟大崛起的历史转型时期，“大国工匠”“工匠精神”已经不是单纯的宣传口号，它已然融入了重新振兴手工文明的历史契机，反思、修正“劳心—劳力”的历史区隔和积弊，恢复中华文明完整的价值体系之大宗者。

### 注释：

[1][2][6][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下），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61—1664、1526、1525页。

[3]王鲁民：《营国：东汉以前华夏聚落景观规制与秩序》，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127页。

[4]吴树平等点校：《十三经》（全文标点本），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1年，第2204页。

[5][9][汉]许慎：《说文解字》，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100、100页。

[7]参见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年。

[8][日]白川静：《常用字解》，苏冰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0年，第129页。

[10]James G.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A Study in Magic and Religion*, Chapter ii—iii,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47, pp. 9—47.

[11]许进雄：《中国古代社会：文字与人类学的透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497页。

[12][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天官冢宰第一》，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13][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考工记》，彭林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661、1663页。

[14]谷衍奎编：《汉字源流字典》，北京：语文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

[15][16][17][美]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6、65—66、67页。

[18][古希腊]柏拉图：《文艺对话集》，朱光潜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68—71页。

[19]参见彭兆荣：《新木马记：艺术人类学的一种读法》，《世界民族》2016年第3期。

[20][21][法]贝尔纳·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艾比米修斯的过失》，裴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年，第33、34页。

[22]高兵强等：《工艺美术运动》，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第1—3页。

[23][宋]林希逸著、周启成校注：《庄子内篇齐物论注》，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50页。

[24][28][31][德]薛凤：《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吴秀杰、白岚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113、111页。

[25][德]薛凤：《工开万物：17世纪中国的知识与技术》，吴秀杰、白岚玲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5年。

[26][法]爱弥尔·涂尔干、马塞尔·莫斯：《原始分类》，汲喆译，渠东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27]参见[德]雷德侯：《万物：中国艺术中的模件化和规模化生产》，张总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第98页。

[29][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导言”，第2页。

[30][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潘吉星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6页。

[32]周秉钧：《尚书易解》，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3页。

[33]叶舒宛：《文学人类学教程》，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83—204页。

[34]参见王冰：《物理学史话》，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第2—3页。

[责任编辑：刘姝媛]